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

◎ 杜常顺 主编

早期羌史研究

李健胜 武刚 等著



人民出版社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

◎ 杜常顺 主编

早期羌史研究

李健胜 武刚 等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刘智宏

责任编辑:岳改苓

封面设计:张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羌史研究/李健胜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丛书/杜常顺主编)

ISBN 978-7-01-013653-0

I. ①早… II. ①李… III. ①羌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秦汉时代 IV. ①K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7136号



早期羌史研究

ZAOQI QIANGSHI YANJIU

李健胜 武刚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2.25

字数:200千字

ISBN 978-7-01-013653-0 定价:34.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丛书总序

杜常顺

青藏高原是举世瞩目的自然地理区域,同时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特别是围绕青藏高原主体民族——藏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藏学这样一门显学。很显然,在青藏高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民族生成、发展与流变以及民族迁徙与交融等重要内容。青藏高原从先秦时期就是羌人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正是他们创造、奠定了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基础。秦汉至魏晋时期,匈奴、月氏、汉、鲜卑等民族陆续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此后汉族一直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区域最主要的民族之一。而东胡系统的鲜卑族中,秃发部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南凉王国,慕容部所属的吐谷浑则在青海高原立国三百多年。7世纪,吐蕃王朝崛起并促成藏民族共同体在青藏高原民族中的主体地位。此后数个世纪中,青藏高原逐渐形成以藏族为主体,汉族、蒙古族、回族、撒拉族、土族、门巴族、珞巴族等多民族交错共存的局面。

作为历史文化区域,青藏高原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气息,民族与宗教关系密切。在青藏高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一直盛行于高原各民族社会。7世纪后,佛教在经历了数百年与高原本土宗教文化的斗争磨合之后,终于在10世纪形成了具有鲜明藏民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与宗教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文化特征。藏传佛教不仅成为藏民族思想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且在藏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其教派、寺院往往兼有社会经济与政治实体的功能,深刻影响了青藏高原的社会及历史进程。伊斯兰教主要是元代以来伴随着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人口的移入而流布于青藏高原的,其影响渗透于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除此而外,汉传佛

教、道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也都汇聚于青藏高原。

基于青藏高原历史中突出的“民族”与“宗教”元素,相关民族史、宗教史的研究很自然就成为青藏高原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些方面已经是硕果累累,积淀丰厚。

在既往有关青藏高原的历史研究中,传统地方史研究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各种地方通史(如《青海通史》、《西藏通史》)成果,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梳理了青藏高原历史的基本脉络,展示了青藏高原历史的基本内容。但青藏高原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区域,还需要有一个更具整体观的研究视角。

近几十年来,区域社会史研究已在学术界蔚为大观,“华南研究”、“江南研究”、“华北研究”等早已引人瞩目。这些区域研究的主要目的,按区域社会史家陈春生先生的阐述,一是要“努力了解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地域性特点”,也就是要“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二是要努力了解“不同地区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正统性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阶层的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形成和发生变化”。所谓在青藏高原历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实际上就是在把青藏高原视为一个整体区域的基础上,全方位把握其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追寻其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与此同时,透过青藏高原区域社会的历史进程,拓展、深化对中国及其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或者说,从青藏高原这种区域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但很显然,在具有“边疆”与“少数民族区域”这种特性的青藏高原区域社会历史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较之前述的华南、华北、江南等一类区域有着全然不同的模式。在元代之前,青藏高原除东部部分区域之外,并未进入王朝国家政治与行政体系之中,区域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内生的地方性秩序;元代之后,王朝国家也仍然奉行“因俗而治”之策,维持了区域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秩序。换言之,在青藏高原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中,除局部地区外,王朝国家力量的介入是有限的,甚至没有介入。如清代虽然将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区域纳入直省统治体系,地方社会形成“内地化”趋向,甚至清末川边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高原大部分地区则属地方性秩序主导下的“藩部”社会。地方性秩序的这种主导地位一直到民国时期也未受到明显的触动。

显而易见,对于青藏高原历史的研究,既是深刻理解和认识区域历史与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完整理解和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需要。

青海师范大学地处青藏高原,长期关注和重视青藏高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并以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近十年来,青海师范大学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并结合相关学科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青藏高原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工作,先后成立了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和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心,整合研究力量,制定研究规划,组织具有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背景的中青年学者开展研究工作。这套丛书就是近年来各位中青年学者努力探索的结果。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些成果体现了各位著者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于青藏高原区域历史的积极思考,凝聚着各位在研究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时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青海师范大学青藏高原文化研究所暨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社会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工作的进展。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以及对新的理论与方法的自觉应用,这些中青年学者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也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青藏高原民族宗教与区域社会历史研究领域的整体水平会得到新的提升。

目 录

绪 论	1
一、1949 年以前的早期羌史研究	1
二、1949 年以降的早期羌史研究	2
三、本书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19
第一章 夷夏羌东中西说	21
一、夷、夏、羌的分布	21
二、夷、夏、羌对我国文明起源的贡献	28
三、夷、夏、羌三族的竞争与融会	36
第二章 河湟洮岷地区青铜文化族别问题研探	42
一、从人头骨数据看青铜文化人群的族属问题	43
二、从葬俗、陶器等看青铜文化的族属问题	47
三、东羌的考古学文化	53
第三章 “大禹出于西羌”辨	62
一、大禹治水及其神化	63
二、禹文化的西迁	69
三、“大禹出于西羌”的历史底层	71
第四章 商周时期羌人族群的迁徙和活动	76
一、商代的羌及羌方	76
二、“亚羌”族徽及羌方的内服	82
三、周初羌民族的迁徙与羌族群记载在文献中的消失	88
四、气候生态与西北甘青地区“西羌”的形成	90

五、结论	92
第五章 先秦东羌问题——以义渠为例	94
一、“东羌”出现的时代	94
二、义渠国史事考证	96
三、义渠的种属问题	100
四、义渠为东羌说	103
五、义渠的地望及考古发现	108
六、义渠国民族习俗与文化	110
七、先秦至两汉时期东羌、西羌的地理格局及其历史内涵	112
第六章 两汉羌人部族及相关问题考索	114
一、见于各种史料的羌人部族	114
二、两汉羌人的地域分野	117
三、“西羌”概念变动的不同视角解读	122
四、羌人部族相关问题考实	132
第七章 早期羌人社会生活研究	142
一、早期羌人的生产方式	142
二、早期羌人的生活方式	158
三、早期羌人的习俗与信仰	166
参考文献	172
后 记	186

绪 论

“羌”，最早见于甲骨卜辞。此后“羌”的称呼频繁出现在周秦、两汉传世文献及出土铭文、简牍中。先秦、两汉时期，早期羌人分布广泛，且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与中原民族有过接触。两汉时，我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广泛分布有以“羌”为名的族群，与之相关的史实需借助传世及出土文献、材料加以辨析。总之，先秦、秦汉的“羌”史，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羌人族群历史、社会变迁的综合，即本书所称“早期羌史”。

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早期羌史有过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或探讨羌人族源问题，或以中原政权与早期羌人的关系为侧重点，或利用考古材料考察早期羌人的社会生活。本章拟以 1949 年为时间界线，综述两个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研探相关的研究方法，以为本书的研究打好基础。

一、1949 年以前的早期羌史研究

1949 年以前，早期羌史和羌族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下材料出土不多，相关研究成果依托于民族史、边疆史和甲骨学的研究，羌族史研究尤其是早期羌史的研究呈现出星散的面貌。雍继荣先生的《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10 期）一文曾对 1949 年以前有关羌族族源的研究情况作出了概述。

20 世纪 40 年代，结合当时开发边疆、抗击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背景，诸多学者第一次较为广泛地对我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先后有胡鉴民、闻宥、马长寿、冯汉骥、王文萱、刘恩兰、庄学本等先生调查发掘了大批资料。1944 年，胡鉴民发表了《羌民的经济活动型式》（《中山文化学

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四期)一文,第一次讨论了羌族的族源。他首次提出羌族来自于河湟流域,是秦献公时期西迁的无弋爰剑之后。这成为羌族族源的主要观点。与此同时,丁骥发表了《史上羌民之记载分析》(《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五期,1944年),通过对文献中羌人分布的排列分析,指出羌族是我国西部之民,分布遍及青、康、甘、藏、新五省之高原地带,自唐历代均有汉化,留居草原地带者虽名称百变,因时而异,其人则仍为羌民。丁骥论述了古羌族历史上的同化和异化现象,深化了对羌族族源的认识。此外,在调查中,许多学者还注意到羌族族源的多元性,马长寿等学者都做过一村一寨的专门调查。董作宾的《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1942年第7期)、刘朝阳的《小乙征羌方考》(《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1946年)两篇文章都对卜辞中羌方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皆为早期羌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二、1949年以降的早期羌史研究

(一)研究概况

1. 关于羌族族源的研究

1949年以降,随着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地下材料的出土,关于羌族史尤其是早期羌史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化。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早期羌史相关问题的认知。随着一批羌史研究论文的发表及综合性著作的出版,羌史研究日益成熟,对羌史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形成了多学科、多角度的认识。1962年,相关学者在成都召开围绕《羌族简史简志合编》一书的羌史讨论会,会后讨论形成《四川讨论羌族历史的有关问题》(《民族团结》1962年第3期^①)一文。此文围绕羌族族源问题形成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徐中舒为主,认为羌人是由南向北迁徙,并举今羌族地区有碉楼、索桥为证;持第二种意见的与会专家认为,羌人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冯汉骥、赵卫邦认为这种迁徙从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缪钺认为

^① 雍继荣先生《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引述此文时注为1962年第8期,经查证应为第3期。

这一迁徙始自战国时期秦厉王称霸西戎后羌人由河湟地区被迫南下,现在的羌人即冉駹的后裔;第三种意见由蒙文通提出,认为现在的羌族是宋代党项羌残留一支形成的,并非古代羌人后裔。成都讨论会结束后,1962年9月3日《光明日报》刊出《关于羌族历史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该意见认为“叙述羌族的族源时,应从殷商之际羌族在西北高原开始形成时作为起点”,这作为成都讨论会的总结写入1963年成书的《羌族简史简志合编》中。^①

这次讨论引发了关于氏羌是否同族同源等新讨论。胡朝曦的《论汉晋的氏羌和隋唐之后的羌族》(《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李绍明的《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黄烈的《有关氏族来源与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等几篇文章都针对上述问题提出针锋相对的见解。李绍明坚持氏、羌同源而异派,黄烈坚持氏、羌不同源说。李绍明在1980年发表《论氏和羌戎的关系》一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论及古史材料和甲骨中的羌族问题,针对前文观点作出补充论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羌史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顾颉刚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一文,系统地论述了羌的由来,其在商、周的活动,与西戎的关系以及秦汉时期的部族分布情况,是早期羌史研究的一篇力作。1984年,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一书出版,该书不仅对羌族源于羌塘高原作出论述,而且对史料中与羌人相涉的各个部族作了系统论述,其中有关古羌人迁徙与盐池分布之关系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王俊杰的《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一文在判断商周羌人与秦汉以后羌人关系时,明确指出二者虽同称为羌族,但并无渊源。何光岳的《氏羌源流考》(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对氏羌的族源和支系作出了整理和论述,在材料搜罗上力求完备,但其观点大多流于臆想,缺乏实据。李文实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的《再论羌藏与蒙古问题》一文论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以及氏、羌、藏之间的关系。杨建军的《羌族起源神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通过史料的钩沉与考究,认为先秦文献中多处

^① 此段论述来自于雍继荣先生《羌族族源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部分失误有所修正。

隐蕴着有关羌族祖先与起源的神话。

2. 关于羌族分布迁徙的研究

随着羌史的研究深入,关于早期羌人的分布迁徙,形成了自西向东说、自东向西说、自南向北和自北向南说几种说法。

——自西向东说。一般认为羌人生活在西部地区,马长寿所著《氐与羌》^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先秦羌族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先秦时期羌族分几次进入中原。羌人的始居地在甘青地区,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也持此说。同为“羌人源于西部论”,有几种观点不同于“甘青说”,值得注意。史文的《古羌人的起源及其迁徙》(《民族论坛》1987年2月)一文认为,古羌人发源于陕甘地区,并向东西南三面迁徙,最终与其他部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何耀华的《试论古代羌人的地理分布》(《思想战线》1988年第4期)一文认为,火葬和披发这两个文化特征是判定古代部落是否属于羌人的重要定性依据,东起临洮、西至帕米尔的广大地区,历史上都是古羌人的发源地。同时,该文还对甘、新、青、藏和川西及川西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的古羌人若干部落种号分别进行研究,考证了各自的地理位置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格勒的《论古代羌人与藏族的历史渊源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2月)认为,藏族在历史上与古羌人中的某些支系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古羌人同藏族先民的自然混合是藏族形成的基础,但不能推断“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管东贵的《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中华书局2010年版)一书中收录了《西羌在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一文,利用文献、语言学及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提出作为青藏高原的原住民,羌人祖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东进,进入大平原东端安土业农,这一部分羌人“着地异化”后与西端的羌人产生了差异。

——自东向西说。自东向西说认为羌人最早居住在东部地区,后向西部迁徙,形成历史上的羌族。其说承袭了《后汉书·西羌传》中“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的记述,认为羌人由三苗西进,进而成为“西羌”。刘夏蓓的《两汉前羌族迁徙论》(《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是此说的代表。作者根据史料

^① 《氐与羌》为马长寿先生遗作,动笔于1962年,创作过程时断时续,到1965年仍未完成。原稿辗转流传,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记载论证了羌族源自三苗,即长江中游的三苗旧居地是羌人的原居地,之后逐步向北、向西北迁徙的历史过程。此外,李吉和的《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中“羌族的迁徙”一节中除引征传世材料外,还列举了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羌人自东向西迁徙的材料。认为羌人自新石器时代始,逐水草西徙,到战国秦汉逐渐形成了以河湟地区为中心,甚至远达新疆、西南地区的羌人分布体系。李文实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再论羌藏与蒙土问题》一文中略述了“西羌与西戎”名称的由来,氐羌关系、羌藏关系以及羌语与藏语的关系问题,其中贯穿着羌人东来之说。牟一之的《民族历史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收录《媯羌国址考》《楚人源于羌族考》《说“临羌”》《从无弋爰剑谈江河源文化与秦文化的关系》几篇文章,谈及有关早期羌人的分布、东西方羌族的交流等重要问题,其中楚人源于羌人说是前人极少提及的。李范文的《先秦羌戎融华考》(《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自南向北和自北向南说。关于这类观点,本书第2页已有一定介绍。之后也有学者对前述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徐平的《试论羌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一文认为羌人是西北民族南迁的一支,并结合羌族史诗《羌戈大战》,重点阐释了羌人由甘青高原的游牧民族进入岷江河谷变为山地农耕民族的历史过程。段渝在《先秦巴蜀地区百濮和氐羌的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先秦川西高原的氐与羌》(《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两文中认为巴蜀地区的氐羌早在夏商就已经出现,主要分布在川西高原。还有其他一些观点,认为羌人分布广泛、遍及东西。如张得祖的《“羌人”浅谈》(《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从陕西西部到甘、青河湟流域,都是古羌人不同种落分布和活动的地方,到两汉时,内迁羌族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北以及中原地区。

关于秦汉时期的羌人分布,学者们也有探讨。佐藤长著、梁今知译的《羌族的来源及其在前汉的活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认为汉代西境主体民族为羌人,当时的羌人处于匈奴统治之下,二者之间当有着紧密关系。秦汉之际,羌人有几次重要的内徙行为,尚新丽的《秦汉时期羌族的迁徙及社会状况》(《南都学刊》1997年第5期)一文论述了秦汉时羌人的迁徙路线、徙居地、迁徙原因。几部民族关系史著作,如翁独健的《中国民族

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杨建新、马曼丽主编的《西北民族关系史》(民族出版社 1990 年版)等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叙述了羌与中原王朝的民族关系和互动。

秦汉时期是羌人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出现在史料中的羌部族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种属杂等特点,十分难以区别和归类。关于秦汉时期羌人的种族和分布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陆续有专家对此作出专门考证。就甘、青、藏地区的西羌来说,马长寿的《氏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认为虽然经过多次东徙和南迁,但西羌的主要部落仍然分布在湟水流域和赐支河曲,并列举了先零、烧当、卑湍、罕开、牢姐、封养等二十余种著名羌族部落。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的《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是第一部详尽的羌族史著作,该书上编叙述宋以前的羌人,对先秦两汉早期羌史和羌民族的分化都有所论述。作为一部系统的羌族史著作,这部《羌族史》对甘、青羌人,新疆、西藏、内蒙古羌人以及西南诸羌等历史上称名为“羌”的各地羌人部落都作了介绍,其中列举甘、青的重要西羌部落十余种,西藏的钟羌、发羌和唐牦等,并认为羌人在上古时期就移居西藏。李宗放的《汉代羌人各部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 年第 6 期)一文按照汉代州郡设置分凉州刺史部、并州刺史部、西域南部、益州刺史部西部和三辅,搜集了文献中可见的各部羌人名称,以种号为名和其他命名方式归类,并对各部间的关系、分布、出现的时间及其简要事迹进行了论述,该文共涉及汉代羌人以种号为名的种落 50 多个,其他名称羌族 20 多个,搜罗较全。此外,陈琳国的《东羌与西羌辨析》(《史学月刊》2008 年第 4 期)、常倩的《商周至魏晋南北朝羌人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届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都对两汉羌人种落有专门介绍。

新疆也广有羌人分布。早在 1944 年,翦伯赞的《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种族的关系》(《中苏文化》十五卷二期,1944 年 2 月)一文就揭示了早在史前时期,塔里木盆地(今塔克拉玛干)就通过甘、青羌人与中原发生关系。诸羌族通过这种交流通道进入新疆地区,甘肃沙井遗址即为西徙塔里木盆地途中的寄顿之所。翦伯赞的这种假说第一次为新疆地区何以广泛分布有以羌为名的部落提供了解释。顾颉刚的《天山南路之羌》(《史林杂识》,中华书局 1963 年版)详细论述了新疆地区的羌人部落。认为媯羌可能是天山南路地区羌人之代表,西夜、蒲犁、伊耐、无雷等几个国家也均属于氏羌一类。此外,该

地区尚有葱茈、白马、黄牛等族,可能与西夜国相关。周连宽的《汉婼羌国考》(《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从语言学角度辩驳白鸟库吉称“婼羌”为“盐地之羌”的说法,指出“婼”为顺之义,婼羌祖先可能以婼为名,故后从之。文章考察了婼羌的地域疆界和基本史实,绘有“汉婼羌国位置图”,是有关婼羌国最为详尽的一篇考证文章。周锡根等的《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列举了新疆地区的婼羌、夏羌、黄牛羌、白马羌、阿钩羌等。马国荣的《秦汉时期西域羌族、车师和月氏的社会生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 2 期)结合考古资料对秦汉时期西域羌人、车师和月氏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作了探讨。钱伯泉的《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 年第 1 期)阐述了龟兹与羌人交相迁徙杂居的关系。

内蒙古西部、河西地区也有羌人分布。周锡根等的《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列举了生活在内蒙古西部居延海一带的南山羌。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详细考察论述了秦汉河西地区的羌人三支、匈奴人五支、月氏人四支以及单桓、居延戎、义渠、焉支、卢水胡、张掖人、敦煌人、乌孙人、塞种人、楼兰人、氐人等十几种民族二十多个部落的情况。关于河西地区的小月氏问题,王宗维的《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2 期)一文对河西地区的卢水胡和小月氏两支部族作出了分析和考证。荣新江的《小月氏考》(《中亚学刊》,中华书局 1990 年版)针对小月氏的族属和去向问题对几种说法提出质疑和解释,对卢水胡、羯胡、龟兹人等被误认为月氏的现象一一作出了剖析。曹怀玉的《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 年第 Z1 期)一文考证了商周秦汉时期活动在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对其族源和族属问题都有所交代。张力仁的《地名与河西的民族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 年第 1 期)则通过对河西走廊有关地名的追述研究,认为羌族是河西走廊历史上分布地域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

羌人也广布于西南地区。马长寿所著的《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认为先秦羌族分布在河西走廊之南,洮、岷二州之西,先秦时期羌族分几次进入中原。战国后期,河湟地区羌人分成三支:一支为越嶲羌,在汉代越嶲郡,大渡河南边的则称为牦牛种;一支为广汉羌,在汉代广汉郡,后移居

到广汉郡西北,称为白马种;一支为武都羌,在汉代武都郡的西部,称为参狼种。参狼种羌的后裔就是北朝时的宕昌羌,而白马羌则在汉代以前就从黄河上游的赐支河曲徙至岷江上游,有可能就是茂汶羌民的祖先。周锡根、李绍明、冉光荣的《羌族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也对西南诸羌作出介绍。关于牦牛羌的来源和名义,何光岳的《牦牛羌的来源和分布》(《中华文化论坛》1998 年第 2 期)根据其名称有所论述。有关白马羌的来源,杨士宏的《“白马”藏族族源辨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胡朝曦的《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之后的羌族》和何光岳的《氐羌源流史》都有专题论述。此外,杨冬晨、周五龙的《论四川西北部的羌族及其演变》[《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8 年第 4 期]认为四川西北部的羌人在秦献公时由西羌迁入,主要有白马羌、冉駹羌、青衣羌和牦牛羌等。

西南地区还有黑水羌。王希隆主编的《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收录的武沐的《密国、岷人与黑水羌》一文认为,商周密人随战争迁往岷江流域形成黑水羌。此外,有关两汉北地郡的巩唐、上郡的沈氏、西河的虔人、安定的烧何等东羌部落,马长寿在《氐与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中认为这些不一定是新迁的西羌,有一部分羌民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居住在那些地区。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一书针对传说时代的羌族、商代的羌方、周秦的羌戎、河湟羌以及东羌所处时空皆有不同的情况,第一次对古羌、西羌、东羌分别加以论述,这对于进一步剖析先秦到秦汉羌人的流动和相互关系提供了科学解读。黄烈将羌族部落笼统划分为河湟羌和东羌。黄烈也是第一位系统地论述东羌的学者,文中列举了为数多达 29 次的东汉西羌内迁事件,认为两汉以来,除了安置于陇西、金城等边郡外,一部分西羌被徙置到安定、北地、上郡等内地郡县,这就是东羌的来源。2008 年,陈琳国的《东羌与西羌辨析》(《史学月刊》2008 年第 4 期)一文对历史上“东羌”现象进一步分析,证明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上郡、北地、云中、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后来进入东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东羌;而内迁入关中者,则仍为西羌,这为学术界聚讼多年的东、西羌问题作出了概念上的明确和深化。而先秦时期的东羌分布状况,仍需要学术界继续努力和挖掘。

3. 其他角度的研究

有关羌人种落问题还有一些其他角度的讨论。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列举了羌族重要姓氏的来源及相关考证,如累姐种后人改姓雷,东羌中的虔人种后改姓虔仁、虔耳,最后更汉姓王,这一研究对考量汉以来羌人种部变迁有很重要的作用。郑方、吴民在《青海诸羌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一文中结合现代藏语讨论了历史上涉羌的人名、地名、族名。

关于羌匈之间的交流交通问题,刘满的《关于西汉昭宣时期的羌匈交通线》(《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一文认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存在着青海东部往西、经柴达木盆地到西域的“青海路”,此是西羌与匈奴的交通线。王宗维的《秦汉时期匈奴和西羌的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一文讨论了匈奴与西羌的接触线、匈奴与西羌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及秦汉政府在匈奴和西羌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等几个重要问题。周松的《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汉文)1999年第1期]认为两汉时期从匈奴控制下解放出来的金城地区羌人,经济上向农业生产过渡、政治上多次结盟,不断进行反对汉政权的斗争。王文光的《秦汉时期民族关系互动述论》(《思想战线》2004年第1期)认为汉羌、汉匈等民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在总体上奠定了中国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密切联系的基本历史格局。

护羌校尉是中央政府管理羌族事务的重要官职,是秦汉羌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点主要在两汉护羌校尉设置的时间上。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顾颉刚的《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根据史籍记载认为护羌校尉设置于元鼎六年(前111年)。胡小鹏的《两汉的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西北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文认为护羌校尉的设置即是金城属国的设置,二者无论从时间还是建置上应该一致,其应设置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马兰州的《护羌校尉与金城属国》(《历史教学》2002年第12期)同于此说。高荣的《汉代对西北边疆的经营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则综合了前两种说法,认为护羌校尉始设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但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则在汉宣帝时期。东汉护羌校尉设置